

## 经典的问题与问题的经典: 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

孙玉杰

**摘要:** 陈永发研究员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中共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先后出版两个版本, 多次印刷, 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2001年的修订版是1998年初版基础上, 参考高华、杨奎松和齐锡生三位教授的书评进行的修订版, 但是, 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就五大问题与陈研究员商榷, 期待促进中共党史的研究。

**关键词:**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 陈永发; 书评

**作者:** 孙玉杰, 淮北理工学院教师、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邮箱: sdj602@126.com

**Title:** Classic Questions and Classic Answers: A Review of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Part One)

**Abstract:**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uthored by Researcher Chen Yongfa, is a classic work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wo versions and has undergone multiple printings, mak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revised edition from 2001 builds on the original 1998 version, incorporating insights from book reviews by Professors Gao Hua, Yang Kuisong, and Qi Xisheng. However, it still presents several issues. This article engages with five major problems and discusses them with Researcher Chen, with the hope of advancing the study of CCP history.

**Keywords:**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Chen Yongfa; review

**Author:** Sun Yujie, a lecturer at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er at the Chen Duxiu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for Rural Reform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rea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mail: sdj602@126.com.

## 一、引言

共产革命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从诞生之起，就引发政界和学界的关注，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已相继出版若干论著。之后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 1949 以后，国内失去正常的学术研究环境，甚至某些话题成为政治禁区；1978 年后，状况逐渐改变，资料和档案也相继有限度地开放，出版大量党史著作，包括通史类的作品，但是，多数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著作。陈永发研究员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sup>1</sup>一书（以下本文中简称陈著），改变了此种面貌。受生活环境和求学经历影响，笔者虽然不尽赞同其书中的相关观点，但是，尊重其表达的权利。陈著从 1998 年初版以来，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和读者的喜爱。著名学者高华教授、杨奎松教授和齐锡生博士等先后发表书评，在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初版存在的诸多问题，甚至有许多史学的“硬伤”。陈研究员是个谦虚和大度之学者，不仅能够接受学术的批评，而且对批评者表示致谢<sup>2</sup>。在参考书评意见的基础上，陈研究员对著作进行修订，于 2001 年 8 月出版二版即修订版，已经八刷。足见陈著因其价值和影响已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典著作之一，被杨奎松教授称为“台湾中共通史研究第一书”<sup>3</sup>。

陈著的主要内容，因学术界已经十分熟悉，不再赘述，可参考

- 
- 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1998 年 12 月初版，2001 年 8 月二版，2011 年 12 月二版八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2 陈永发：《敬答杨奎松先生》，《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1999 年第 27 期，第 195 页。
  - 3 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67 页。

三位学者的书评，特别是齐博士的书评介绍比较详细<sup>4</sup>。按照书评的相关书写原则，一般评论近期出版的书籍，因特殊原因，也可以评论出版时间稍微早些的著作，同时，还遵循书评的其他一般原则<sup>5</sup>。本文是在高教授、杨教授、齐博士书评的基础上，参考一系列著作（根据书评的书写原则，参考文献的时间截止到陈著 2011 年 12 月二版八刷时），从学术视域对 2001 年修订版进行评论。因学识与阅读范围等原因，书评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期待学界再进一步探讨，共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

## 二、学术界对陈著的评价

高华教授认为：“（初版）是一部多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著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私人历史著作，……卓然成一家之言”<sup>6</sup>；杨奎松教授从“锐意求新、研究深入、客观平实、议论风生”<sup>7</sup>四个方面肯定陈著（初版）；齐锡生博士认为：“本书（初版）不但是一部上乘的通论，也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论”<sup>8</sup>；凌锋认为：“（修订版）它是当今华文世界中最权威、最全面、最客观的中共党史教科书”<sup>9</sup>；萧延中教授认为：“（修订版）以翔实的史料和精确的叙述受到海内

---

4 齐锡生：《新书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1999 年第 27 期，第 209-213 页（以下引用此文，简称为：《齐书评》）。

5 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14-225 页。

6 高华：《在史料的丛林中——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二十一世纪》，1999 年 6 月号，第 115-121 页（以下引用此文，简称为：《高书评》）。

7 杨奎松：《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1999 年第 27 期，第 173-194 页（以下引用此文，简称为：《杨书评》）。

8 《齐书评》，第 212 页。

9 凌锋：《陈永发和他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www.epochtimes.com.2002 年 9 月 3 日。

外学术同行的认可”<sup>10</sup>；杨攀博士比较两岸的党史研究后说：“陈著（修订版）显现出的充分优势，独特风格是台湾其他相关研究者所不及的”<sup>11</sup>；杨继绳先生认为：“陈先生本书（修订版）的一个特点是充满理性”<sup>12</sup>，等。无论是初版还是修订版，学术界对陈著给予高度评价，足见陈著是一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 三、经典的问题

学术界在高度评价陈著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缺憾。高华教授认为：“陈著（初版）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个别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sup>13</sup>；杨奎松教授指出初版有四个方面的缺失：“锐意求新有不足、着力不均、规范须严、议论风生有可商榷处”<sup>14</sup>；齐锡生博士认为初版存在四个问题<sup>15</sup>；杨继绳认为：“（修订版）这边（大陆）的资料太多，对大陆读者来说，新意不多”<sup>16</sup>。2001年二版就是在高教授、杨教授与齐博士书评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后的再版，但是，2001年8月二版的2011年12月二版八刷版本，仍然存在诸多遗憾。笔者提出五类问题与陈研究员商榷。问题的提出与分类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为叙述的方便；二，为行文结构平衡的需要，界限比较模糊。同时，为简洁原则，凡是引用陈著的文字，尽量简化，不讲究整体性，只引用关键段落或关键词语；三，问题的分类以及撰写，按照在陈著中书写的顺序，便于读者对照阅读。

---

10 萧延中：《“毛泽东研究在台湾”掠影》，《党的文献》，2006年第6期，第90-91页。

11 杨攀：《1980年以来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武汉大学，2013年，第63页。

12 杨继绳：《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炎黄春秋》，2016年第4期，第79-83页。

13 《高书评》，第116页。

14 《杨书评》，第173-194页。

15 《齐书评》，第212页。

16 杨继绳：《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第79-83页。

## （一）语言或表述问题

“历史”在英文中的表达是“History”，直接翻译成中文是“他的故事”。“他”是第三人称词语，原意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要客观、公正，包括语言的客观，词性还要中性，不偏不倚，这样才能表达历史原本的意义。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陈书行文及用词上主观和随意性似也有可指摘之处”<sup>17</sup>。历史著作的语言要严谨规范，但是，陈著中的语言，如杨教授所指出现象太多，不是“似也有可”，而是“确实有”。

1. 词语问题。“似乎”、“好像”、“几乎”、“所谓”，等，特别是“似乎”一词使用太多。据不完全统计：第17页、30页、66页、78页、104页、109页（使用“好像”一词）、114页、124页、133页、145页、151页、162页（两个）、173页、186页、193页、206页、219页、223页、301页、428页、429页、437页、448页、477页（两个）、479页、482页（两个）、483页、505页（三个“所谓”）、506页、507页、517页、518页、521页（除了“几乎”还有三个“所谓”）、528页、530页（两个）、531页（一个“几乎”四个“所谓”）、542页（三个“所谓”）、547页、550页、551页、675页、678页、681页、700页、701页、705页、718页、722页、746页、754页、758页、769页、776页、780页（两个）、781页、785页、788页、799页、821页、825页、827页、828页（两个）、834页、845页、850页（两个）、852页、854页、863页，等等。笔者从来未见过一本历史学著作使用那么多“几乎”或“似乎”，而“几乎”或“似乎”在汉语中是“表示十分接近或差不多”、“仿佛、好像”的意思<sup>18</sup>；另外，“可能”一词的使用也较多。第267页，图片介绍内容中，图中左7杨尚昆的职务介绍，使用“可能”一词，在历史著作中，运用不准确。该图片在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非常清晰，杨进入苏区后，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干事、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与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

17 《杨书评》，第186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6年，第598、1242页。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sup>19</sup>；同时，“1980年代任中共军委副主席”的表述，也不准确，杨在1982年9月10日，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sup>20</sup>；第276页，注释7中，“王稼祥当时27岁，很可能也在毛泽东的军队中代理政治保卫处长”，“很可能”一词，也不规范。作为历史学著作，表述要准确。王稼祥到苏区后，“兼任中共苏区中央局政治处长”<sup>21</sup>，同时，“在毛泽东的军队中代理政治保卫处长”的表述太过随意；注释8，引用的文章没有页码；第441页，“刘少奇是一个有革命使命感的组织专家，目睹土改中的流血情况，可能毫不动容，但看到农村支部党员的大批被斗，却未免担心起来”，又出现“可能”一词。在历史学著作使用那么多此类语言，不太严肃。因为，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是求真、求实，来不半点“几乎”、“似乎”与“可能”等不确定性用语。

2. 错别字或不规范的现象。一，第23页、900页，其中900页使用10次“平反”词语。“平反”一词，利用不规范，不符合中共党史用语习惯。中共党史上多用“甄别”或“改正”一词。用“平反”不符合中共历史表述习惯。而且高华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此问题，两词的涵义差别大<sup>22</sup>。二，第93页，“独力自主”成语中，“力”应该是“立”。三，第135页，“（上海大学）其前身是一所野鸡大学”。此论断，尽管来源于当事人的回忆<sup>23</sup>，

19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20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359页。

21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一九〇六—一九七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22 《高书评》，第120-121页。“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93页；（尽管，也有著作使用“平反”一词，如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但是，可以发现，即使使用“平反”一词，仅是表面用词，里面还是用“甄别”或“改正”词语，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029-1030页；同时，文件或档案中也多使用“甄别”、“改正”）。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

但是，要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资料，同时，也与136页的注释9-12的描述内容不相符合；另一方面，也与学术界研究成果不符合。当时社会上曾流传“五四时期有北大，大革命时期有上大”之说<sup>24</sup>。四，第192页，“1927年以前的中共并不是现代产业工人自发领导的革命”。此句语法不通，主语是中共，宾语是革命，显然不对等，即中共是革命，表述错误。五，第205页，“在地的地方士绅”中，两次使用“在地的”，不知道什么意思？难道还有“在天的”？应该是多余的或印刷时出错的。六，第283-284页，在叙述第五次围剿战中的国军伤亡情况时，283页是“国军死伤24000余人”，而284页却是“24000人”。问题一，史料来源？问题二，为什么前后不一样？283页多个“余”字，而284页正好是整数“24000人”。证据何在？七，第338页最后一段第一句，“分散在皖南、皖北和苏南的新四军，们最初认为”。此处，在“军”字后面，明显多个“，”。“中共枯等年余”，“枯”应该是“苦”。八，第374页，“这是中共从1935年以后第一次召开类似性质的会议”。“类似性质”是什么意思的会议？九，第844页，图片介绍文字中，“决定将邓小平流放到东”。此处“东”是什么地方？读者不明不白，应该是“东交民巷”<sup>25</sup>。十，第845页，“宁愿真除老实的华国锋为总理”。语段中“真除”，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按照上下行文逻辑看，应该用“任命”或“让”等的意思。十一，第851页，“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臭老九”。此论断既武断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十二，第897页，图片下面的介绍文字中，“数苍茫大地”，应为“问苍茫大地”<sup>26</sup>，等等。

## （二）学术规范或史料问题

历史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之一，规范性是基本的要素之

---

版社，1980年，第29页。

- 24 徐世强：《上海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红色学府”》，《党史博览》，2010年第11期，第54-56页。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5页。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页。

一。傅斯年说过“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sup>27</sup>，也就是历史研究要讲求史料证据。杨奎松教授已指出，1998年初版中，“陈书注释全无规律可循，有时平均一页达不到一条，不仅如此，陈书注释全无规范，有时整段整段，甚至整页整页无注，有时却具体到一句话一注，让人不明所以”<sup>28</sup>。2001年修订版中，因要回应高教授、杨教授与齐博士书评的质疑，新增加许多参考文献，较1998年初版有所改观，但仍然有许多学术规范或史料问题，包括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即使给出的新注释却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读陈著时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失望”，激动于“新的史料、新观点”，失望于“无学术规范，甚至于对事件作信口开河式的评价，乃至‘史实’的错误”，而且，高教授、杨教授与齐博士在书评中，已经指出的问题，还仍然存在。

1. 第13页，“更不会像一些美国学者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学者是指谁？该观点来源于哪里？

2. 第74页，注释6，在分析陈独秀的民族自尊心，不愿意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未去参加中共一大时。作者说：“为了釜底抽薪计，陈独秀一直强调中共应该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可能由于这一考量，他决定不回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如果他在广东办学的计划成功，中共或许以后就不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了。”注释6给出的参考著作中，找不到原作者要表达的此种意思<sup>29</sup>，不知道根据什么，陈著推演出此解释的。杨奎松教授的书评中，已经指出“作者多半是仅根据包慧僧的回忆”<sup>30</sup>。包慧僧的回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另当别论，问题是，历史没有正确答案，包的解释也仅是一种历史解释。但是，陈著中注释6补充的自己的观点，不能算到引用的资料中，可以另外作解释，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于陈独

---

27 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第44-50页。

28 《杨书评》，第184页。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84、388、389页；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8、149、154、155页。

30 《杨书评》，第182页。

秀没有参加一大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解释<sup>31</sup>，已经是非常清楚的问题。

3. 第 93 页，引用图片《晨报》上《为陈独秀君募集诉讼费启示》中，署名人之一是“胡适”，而图片下方介绍文字中，却变成“胡适之”，虽然是同一个人，要尊重历史的原貌，恢复历史的现场感。

4. 第 97 页，注释 2 是 2001 年修订版中新增加的一个注释，是为回应杨教授书评对 1998 年版 89 页相关内容的质疑<sup>32</sup>。后面补充内容中，“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经列举他反对和国民党合作的理由如下”，存在的问题：一，陈著中列举四条理由，而陈独秀提出的是六条理由，不完整；二，与参考文献原著 163 页的内容无关；三，陈著的补充内容，语言的应用与原著也不一样，导致用语缺乏严谨性，甚至可能发生曲解陈独秀的原意的问题<sup>33</sup>。如，理由的第一个原用语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陈著中说是“中共和国民党没有共同语言”，被严重口语化，寓意可能会相差十万八千里，陈著参考文献《陈独秀年谱》的内容来源于杨教授书评中参考的文献<sup>34</sup>，陈著应该引用此最权威的文献。

5. 第 115 页，图片资料中引用的“四·一二”政变之后，“据中共统计，从 12 日到 15 日，约有 300 人被杀，500 人被捕，5000 人失踪”。问题：一，该数字的史料出处何在？二，杨奎松教授、齐锡生博士都曾指出该数据在 1998 年初版中第 106 页和第 176 页的数据不一致的前后矛盾问题<sup>35</sup>。但在 2001 年修订版中，陈著在 187-188 页，把 1998 初版 106 页和 176 页原来相矛盾的数据改为“结果四天之内共有 300 多工人和党员被杀，500 多人被捕，5000

---

31 郑天贵：《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一大之原因》，《党史纵横》，1990 年第 5 期，第 24-26 页；王其彦：《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齐鲁学刊》，1991 年第 4 期，第 116-117 页；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第 165-179 页。

32 《杨书评》，第 182 页。

33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 165 页。

3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31-32 页。

35 《杨书评》，第 177 页；《齐书评》，第 212 页。

人下落不明”，这样上述两处的数据就一致。可见，上述两处的数据是同出一个参考资料<sup>36</sup>。1998年初版中矛盾的数据主要是引用不同的资料而产生，如果当初加以说明，此类问题也不会产生；三，在188页注释26的补充内容中，又将1998年初版176页的数据拿出来，其目的是说明“其实，关于被捕和被杀工人的总数，没有人弄得清楚”，以回应杨与齐书评的质疑。如果，在1998年初版，就这样引用和说明，杨与齐书评质疑的问题就不会产生；四，还有个有问题是，在1998年初版106页，引用的数据前是“共”字，而到2001年修订版115页却变成“约”字，而且原参考文献资料中，既无“共”字，也没有“约”字；2001年修订版188页引用的数据前是“四天之内”，而引用的原资料上却是“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天中”。而且，2001年修订版的数据前，正文引用中缺少“据不完全统计”，显得2001年修订版的数据是完全统计的数据，这是不该出现的错误；五，在数据的原资料中，也没有“据中共统计”这些限制性词语<sup>37</sup>，不知道陈著中，为什么会添加上？造成此问题的责任，应该完全由作者负责。

6. 第143页，注释21，陈著认为，“关于谁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迄无定论”。问题是，“迄无定论”的结论，证据何在？陈著引用的《张闻天传》，说明“‘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词是一部分人带着宗派情绪叫出来的，与‘十天会议’的事实相去甚远”<sup>38</sup>。其实，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说的已经非常清楚<sup>39</sup>；注释22，引用余敏玲的博士论文。笔者查余的博论88页和145页<sup>40</sup>，也没有陈著引用的意思表达，不知道为何？同时，列举的余博论书目中，多个“P.”字；注释23，引用余敏玲的文章，无论是题目还是内容，都存在问题，余文的原题是《国际

36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37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第50页。

38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39 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第10-22页；何方：《张闻天与“二十八个半”》，《文史精华》，2003年第9期，第4-9页。

40 Miin-ling L.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5. p.80, 145.

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而陈著引用中少时间界定（1925-1930），到 999 页注释 1 时，余文的时间界定又搞错误成（1925-1939），再到 1090 页附录的参考文献时，又少时间的界定（1925-1930）；更严重的内容错误在于，余原文中注释 25 表述的内容，也是转引《前进报》（苏联）的报导，“当时莫斯科工厂最高到最低（经理到童工与生手）的工资分别为 225 和 30 卢布”<sup>41</sup>。在陈著注释 23 中，却表述为“当时莫斯科工厂工人的工资，最高每月 225 卢布，最低 30 卢布”，与余文转引的资料原意差别较大。同时，该注释还引用刘杰诚的研究成果，认为“（刘杰诚）对中山大学预算的估计是，一年一千万卢布，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但是，此论断在陈著参考的 1993 年版刘著 99 页中，就根本没有此数据<sup>42</sup>，刘著的修订版 99 页，也没有此数据<sup>43</sup>，要么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数据，要么是引用错误导致；注释 24 的内容，在余博论中的 121 页，也没有反映出来<sup>44</sup>。

7. 第 144 页，“更有数百人被送到‘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劳改”。注释 26，表明资料来源《张闻天传》第 107 页，但是，该著的 107 页，并没有此处引用的内容<sup>45</sup>；该引用还有一个出处是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而此书 36-37 页，也没有明确的表述陈著中的引用内容。唐书的表述：“反对王明的同志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流放，有的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受害者达二百多人”<sup>46</sup>；出处的第三个资料是毛齐华的《追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的几个问题》，该文 62 页，也没有陈著中引用的内容<sup>47</sup>。即使按照唐著资料来演绎出来，数量表达为“数百人”也过于夸张，因唐著中是“达二百多人”。

---

41 余敏玲：《国际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 年第 26 期，第 235-264 页。

42 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99 页。

43 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第 99 页。

44 Miin-ling L.Yu: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1995.p.121.

45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 107 页。

46 唐有章口述、刘普庆整理：《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6 页。

47 毛齐华：《追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1997 年第 63 辑，第 50-64 页。

8. 第 149 页,“(杨明斋)不洗澡,也不换洗衣物,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精神看来十分不正常”。注释 29 说明,资料来源于《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72-74 页和《“一大”前后》(三)第 114 页。但是,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72-74 页中,找不到表达杨明斋“精神看起来十分不正常”的表述,相反则有“杨明斋虽然外表上污浊不堪,不拘小节,但仍不失正人君子的气质”<sup>48</sup>的表述,可见,杨是正常人,其行为,应该是赌气的表现;而在《“一大”前后》(三)的第 114 页,根本没有提到杨明斋的情况<sup>49</sup>。

9. 第 223 页,“毛泽东便率残部约 1500 人,南下湘赣边的崇山峻岭,另谋出路”。杨教授书评中,曾指出 1998 年初版 211 页和 223 页数据不一问题<sup>50</sup>。在 2001 年修订版中,陈著将 1998 年初版 211 页数据删除掉,保留 223 页的数据,并加一个注释 43,而且该注释还说是“官方的说法”。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注释 43,并不是数据的出处,只是提供用来解释说明自己引用的数据准确性,而且注释 43 的数据,在给出的参考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出现“结果剩下 700 百人继续南下”<sup>51</sup>的说法;“共七百余人的数据来源于王健英的著作<sup>52</sup>,这两个资料,也没有讲清楚陈著的数据来源。同时,在 236 页,还继续坚持“率领 1500 的残余人马南下逃窜”;238 页图片介绍文中又说“率残部千余人南下湘赣边境罗霄山的中段”。同一著作中,相关的内容、数据如此混乱,前后矛盾的现象,不应该出现,应该理清楚,即使数据出现打架的现象,最好的处理办法是注明出处,以免造成混乱的现象。

10. 第 234 页,“党员人数从 60,000 遽减为 10,000”;到 239

48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73 页。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14 页。

50 《杨书评》,第 177 页。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9-222 页。

52 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第 17 页。

页，“党员的数量由 60,000 陡减为 10,000”。在 1998 年初版 221 页和 226 页，相关数据是“党员人数从 60,000 遽减为 10,000”、“党员的数量由 40,000 陡减为 10,000”。2001 年修订版本中，两处的数据之所以保持一致，是因为杨奎松教授对此数据的质疑<sup>53</sup>。陈著中，多次出现此种现象，对 1998 年初版质疑的地方，2001 年修订版会作一定的修改，无论是否有史料来源，此处的修改就属于此种情况。但是，此处仍有问题：一，在没有给出新参考文献的前提下，而且数据就变成一致，为什么？二，234 页使用“遽减”到 239 页变成“陡减”，从“遽”变成“陡”有什么区别，两处数据一样，位置也靠近，属于重复利用，应该去掉一处。

11. 第 242 页，注释 3 存在有两个问题。一，引用的内容，在《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上）第 184-187 页中，根本没有陈著中引用的内容或表达的意思。要求周恩来回国的是中共中央<sup>54</sup>，“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瞿秋白先后动身回国，纠正中共中央六月十一决议的错误”<sup>55</sup>，是在 188 页，而且也没有“并恢复城市共产党、共青团和各种群众组织分家的作法”的意思表达，是“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sup>56</sup>。二，注释 3 中“在此之前……”的内容，史料来源于何处？

12. 第 273 页，“结果虽然又有四、五千人被戴上 AB 团的莫须有罪名，且至少有 2000 多人遇害，但事情并未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该数据与 1998 年初版 260 页，遇害人数“约有 500 人”，明显不同，差异较大。高教授书评中，不仅质疑 1998 年初版 260 页的数据问题，而且提供了不同争论的史料来源，并指出“肃 AB 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sup>57</sup>。历史研究中，有争论是正常之事，只要提供不同的史料来源，言之有理即可。现在的问题是，在 2001 年修订版和 1998 年初版中，注释中引用的史料

53 《杨书评》，第 177 页（杨教授对此处的质疑，页码标注错误，前一个数据是在 1998 年初版的 221 页，书评中标注为 211 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86 页。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 188 页。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 191 页。

57 《高书评》，第 116 页。

来源一样<sup>58</sup>，但是，结论的数据却不一样。而且，陈著注释中也承认，“至今仍有争论”，如何解释？陈著中引用的文献是陈研究员自己的一篇文章，也是关于肃 AB 团研究的权威文章之一。但奇怪的是，陈著前后版本中都出现的数据，却在引文原文中根本没有出现过<sup>59</sup>，而且，陈著在注释 4 中补充的内容，还涉嫌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成果加以引用的嫌疑。从引文的内容看，是别人的研究成果数据，从引用形式上看是自己的成果。其实，此处应该是转引，但是陈著中却采取直引的方式，从而造成是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印象。而且，注释 4 是为回应高教授的质疑新加的一个注释，与注释 5 同是陈自己的一篇文章。注释 5 是为印证“成功的人是难以责备的，毛泽东的肃反责任便迅速被人遗忘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陈研究员发表此文，就已经说明肃反责任“没有被遗忘”；二，其实，所引陈研究员自己文章的观点，与此观点恰恰相反，“从研究 AB 团案中，我们发现毛泽东确实有相当大的个人责任”<sup>60</sup>。不知道，陈著引用此参考文献的目的是什么？是证明还是反证陈著中的观点呢？作者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应该保持一致，否则要给予史料证据来加以解释。同时，陈研究员所服务单位的《集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对“肃反”的研究，也较有价值，而且对“肃反”AB 团案，说明的更清楚，尽管不是专门研究“肃反”的文章<sup>61</sup>。学术界对 AB 团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可以参考进一步搞清楚此问题<sup>62</sup>。

13. 第 296 页、300 页、301 页与 303 页，关于长征时期的红军

---

58 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 团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 年第 17 期，第 193-217 页（此处，对于是否有注释问题，发生分歧，高教授认为，1998 年初版 260 页，没有提供注释（《高书评》，第 116 页），笔者始终认为，此处引用陈研究员自己的这篇文章（学术不规范引起的祸））。

59 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 团案》，第 193-217 页。

60 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 团案》，第 269 页。

61 翟志成：《中共与党内知识分子关系之四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 年第 23 期，第 212-220 页。

6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1985 年，第 627-648 页；戴向青、罗慧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高华：《“肃 AB 团”事件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1999 年 8 月号，第 60-70 页。

数量，交代混乱，容易引起歧义。杨奎松教授、齐锡生博士在书评中，已经指出此问题<sup>63</sup>。2001年修订版的问题：一，数据来源的史料是何处？而且301页的注释1，是为应对齐博士的质疑才在2001年修订版中新增加的注释<sup>64</sup>。注释1的问题：仅能回答军队前后的变化，而党员前后的变化，怎么回答？从行文逻辑上，“党员由极盛时期的30万锐减为4万，而军队则由30万锐减为3万”，这是一句话，而且说“这是中共官方所给的数字”，这个结论的证据是什么？参考引用的是王健英的著作，王的观点能够代表中共官方吗？王著中此数据也没有给出史料来源，更不含有“中共官方之说”的意思<sup>65</sup>，要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能够代表中共官方，还能理解。二，在1998年初版291页，原表述为“在7万战斗部队之外，又有机关人员9千和民夫5千随行”。可能为应付杨奎松教授的书评，在2001年修订版中303页，前面加上“全部86000兵员当中”。三，300页图中的介绍文字说，“虽然共军从大约30万减少到大约3万”，但是在1998年初版288页同样的图片上介绍的数据却是“约20万减少到约4万”。300页图片中的数据也应该是来源于参考的王著，但是，300页的数据，不仅与301页的不同，“（300页）大约30万减少到大约3万”到“（301页）由30万锐减为3万”，而且，300页和301页的数据与王著的原始数据也有差别，在王著中，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全国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长征到达陕甘后，只剩下三万人左右”<sup>66</sup>，可见，由“大约30万、大约3万”到“30万、3万”再到“三十万人、三万人左右”。对一个历史事实的叙述，如何解释前后版之间的数据差距，而且都没有给予史料佐证的来源，这些数据岂不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中，无论如何不应该出现如此的现象。

14. 第424页，注释17，引用的《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分为上、中与下三册。陈著中，引用的注名是2册即中册，但是，在此

---

63 《杨书评》，第177-178页；《齐书评》，第212页。

64 《齐书评》，第212页。

65 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第88-89页。

66 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第88-89页。

册的 248 页，根本没有陈著中引用的内容，引用的内容在下册即陈著中 3 册的 248 页<sup>67</sup>。按照陈著的标法应该是 3 册。同样的问题，还存在 425 页中，注释 18，与 424 页的注释 17 的问题一样，在 430 页，注释 25，没有标注引用的《毛泽东年谱》是那一册？从引用的内容来看，是下册，但是在下册的 260 页的内容与陈著中表述的内容不尽一样，“你们两个纵队派至冀东，配合晋察冀全力在明年春夏两季，不但占领北宁路津榆段的大部，而且可能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个至两个缺口，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经东北输送炮弹、炸药至华中、中原与西北，此种任务极为重要”<sup>68</sup>。而在陈著中却表述为“东北现代化工业的重要性遂愈益明显，因伪它是关内共军砲弹和炸药的主要来源”；在 449 页，注释 30，原文是“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sup>69</sup>。到陈著中成为“面对这种种过左过火的现象，中共中央虽然不时重申反对，特别是反对没收商人及摊贩的资产，但是在土地革命的高潮期间，基本上是不会有基层干部愿意听的”。这种引申发挥原著引文意思的现象在陈著中多次出现。历史解释可以，也应该多样化，但是，解释必须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引文的愿意，而陈著的解释仅是自己对历史现象的看法，也是正常之事，但是，此种情况的发生，就不能再用别人的著作来注释，不能算到引文作者的责任。高华教授指出，“可能是又出于史家的谨慎，使用该书（指《毛泽东年谱》）的频率较低，……但是过分的谨慎也会带来问题”<sup>70</sup>，再谨慎，也不能随意发挥原著的意思。

---

6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48 页。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下），第 260 页。

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下），第 264-265 页。

70 《高书评》，第 119 页。

15. 第 515 页，注释 27 中引用的《邓子恢传》中，多两个字“违法”，变成《邓子恢传违法》。而且，陈著的引文，也没有完全忠于原文，与原文的意思有不一样的地方，《邓》中没有提到武汉市长吴德峰的错误<sup>71</sup>，陈著中，却认为“正副市长的错误是偏听偏信”。

16. 第 564 页，“苏共同意针对其中约三分之一，也就是 141 项大型工程”。在 1998 年初版 547 页中的表述是“苏共同意针对其中约三分之一，也就是 156 项大型工程”。之所以，把初版中的“156 项”改为修订版中的“141 项”，是回应杨奎松教授的质疑<sup>72</sup>，同时，为解释为什么会作出此处修改，增加一个注释 22，可是在引用的原著 1995 年修订版中，根本没有出现“141 项”的数据<sup>73</sup>，不知道“141 项大型工程”，出自何处史料？难道，就是为回应杨奎松教授的书评而故意修改而成？还有个问题，前面有“苏共同意针对其中约三分之一”的逻辑前提，后面的数字，无论是“156 项，还是 141 项”都是“其中约三分之一”吗？明显是为应对杨教授的质疑，顾后不顾前的修改。杨教授书评，已经给出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参考文献<sup>74</sup>，不知道为什么？陈著不用，反而去要使用一个没有引用内容的著作作为参考文献，难道就是为应付质疑吗？第 759 页，“1958 年起，分五年共同进行或由苏联援华进行重大科研项目 103 个，并在原已达成的 156 项经济合作项目以外，再增加 55 项”。此论断，与 1998 年初版 738 页的相关内容一致，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对此论断提出质疑<sup>75</sup>，在 2001 年修订版中，为回应杨教授的质疑，添加一个注释 3，同时，把相关内容，分开进行解释，又增加一个注释 2，其实，注释 2 与 3 的论证内容，可以合并在一起。关键的问题是，如此费尽心机地进行注释，也没有回答杨教授的质疑，在注释 3 给予补充，加以另外说明，引用杨教

71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38-439 页。

72 《杨书评》，第 178 页。

73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516-523 页。

74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9-40 页。

75 《杨书评》，第 179 页。

授提供的参考文献<sup>76</sup>，问题就解决，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没有解决问题。

17. 第 595 页，注释 5 是 2001 年修订版中新增加的参考文献，是为回应杨奎松教授对 1998 年初版的 579 页，“随后将其（指叶剑英）调离广州，另派外来干部接替其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的质疑<sup>77</sup>。但是，给出的参考文献《陶铸传》的页码出现错误，引用的内容不是在该书的 23-26 页，而是在 225-226 页<sup>78</sup>；同时，为说明，2001 年修订版中新增加的内容“另派与他（指叶剑英）素有嫌隙的陶铸接替方方的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参考文献给出的伍修权的《我的历程（1908-1949）》，可是在参考文献的第 163 页，根本没引证的内容<sup>79</sup>。同时，在此注释中，还参考陈研究员自己的一本名著《延安的阴影》，内容倒是体现出来，还有在《延安的阴影》中，此内容仍然没有标明出处<sup>80</sup>，等于自己用自己没有史料来源的著作来引用论证自己另外的著作，只能起到以讹传讹的作用。同时，在《延安的阴影》中，论证陶铸在延安审干的情况时，引用《李逸民回忆录》，可是李的回忆录中，仅提到“陶铸同志因坐过敌人的监狱，也被整成‘叛徒’”<sup>81</sup>，没有讲到在 2001 年修订版注释中的“当时未闻叶剑英对他有任何救援行动”，也没有提到《延安的阴影》中引用的内容，更甚至者，作者还把引用的《李逸民回忆录》的页码和版本时间搞错误<sup>82</sup>，李著中，讲到延安整风的内容在第 109-120 页，不是在 37-38 页；李著是 1986 年出版，不是 1981 年出版<sup>83</sup>。

---

76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20-222 页。

77 《杨书评》，第 184-185 页。

78 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年，第 225-226 页。

79 伍修权：《我的历程 1908-1949》，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第 163 页。

80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60），1990 年，第 122 页。

81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17 页。

82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第 183、330 页。

83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第 109-120 页。

18. 第 599 页，注释 12、13，与 1998 年初版中 583 页注释 9、10 页的内容一样。杨奎松教授，在书评曾指出存在的问题，但是，杨教授的质疑也存在问题，杨教授书评中认为，“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段话并非完全无注，但第一，注文错误：《陈云文选》.3:202-16，不确”<sup>84</sup>。杨教授的问题是，陈著中这段话的注释文章，来源没有问题，这段话确实来引注原文，而不是来源陈云的著作。陈著 2001 年修订版中，因回应杨教授的质疑，把 1998 年初版的《陈云文选》.3 改为 2001 年修订版中的《陈云文选，一九四九 - 一九五六》，页码未变。杨教授却又认为是《陈云文稿选编》的 189-203 页，其实陈著的引文，虽然与杨教授认为的文献版本不一致，但是，内容是一致的即《陈云文选，一九四九 - 一九五六》的第 202-216 页和《陈云文稿选编》的第 189-203 页是同一篇文章，只不过收入在不同版本的陈云著作之中。杨教授也是没有认真核对史料，便提出质疑。而陈研究员面对质疑，缺乏认真思考，便修改成杨教授质疑的版本，被书评牵着鼻子走。

19. 第 628 页，“从他们（指资产阶级）身上连挤带压，中共总共累积了约 20 亿美元的罚款，足够打韩战一年半之用”。此论断，在 1998 年初版第 611 页。杨奎松教授提出质疑，并引用徐焰著作中的一个数据来反驳陈著的此论断，“从 1950 年至 1955 年中国共欠苏联 56 亿旧卢布的债务（相当于 13 亿美元），其中一半左右是用于抗美援朝的军火贷款”<sup>85</sup>。因此，杨教授问，“韩战一年战费如何得了 20 亿美元？”<sup>86</sup>。杨教授的质疑也存在疑问：一，徐著中的数据也未注明出处，用“未注明出处”的数据来反驳陈

84 《杨书评》，第 185 页。

85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 年，第 32 页（徐著中此数据，未标注参考文献，在陈著给出的参考文献姚旭的文中如下表述，“一九五〇年以来，我们向苏联借款总共五十六亿旧卢布（约合十三亿四千万美元），其中用在朝鲜战争的就有三十亿旧卢布，占去一大半”。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周年》，《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5-14 页）。

86 《杨书评》，第 187 页。

著中“未注明出处”的数据，结果还是“未注明出处”，而且关键是徐著的“共欠”的债务都是军火贷款吗？徐未作具体说明；二，此数据在徐著的32页，不是22页，同时，徐著界定的时间至1955年，杨教授书评中到1956年，多出一一年。面对杨教授的质疑，陈著在2001年修订版中依然坚持“约20亿美元”数据的同时，对使用的时间进行微调，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一，在战争费用未变的前提下，比1998年初版在时间上多“半年”变成“一年半之用”<sup>87</sup>，在“约20亿美元”费用未变化的前提下，在2001年修订版中比在1998年初版中，多打半年之久。二，补充一个注释给予两个参考文献，算是回应杨教授的质疑，给出的注释13中还说“这里关于韩战的用费是低估”，此论断的理由是参考文献之一的姚文中的数据是“一年需33亿美元”，姚文中还有一个数据，“我们在朝鲜战争中花去了一百亿美元，给朝鲜的援助是无偿的”<sup>88</sup>，即使按照时间来换算，也得不出年需33亿美元，姚文也没有说明都是用在军费上。问题是姚文的数据，也未给出参考文献，陈著把它当作权威的数据，而且还是1980年的文章，明显陈旧。同时，下引的参考文献，也没有给出“约20亿”的来源文献，还是没有解决数据的来源问题。三，引用《毛泽东选集》的内容与原著的内容，也不尽一致，“1951年用在韩战的费用相当于当年国内建设的全部费用，1952年减半”，而在原著中是“去年抗美援朝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指1952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此讲话是毛泽东本人对战争费用的估计，而且此讲话是1952年8月4日，离1952年结束还有四个月，讲话中使用的是“大体”、“估计”<sup>89</sup>，都有不确切之意。另外，不能理解的是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提到“笔者完全同意作者在此所得出的观点”，即“采取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属错误”<sup>90</sup>，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1998年初版和2001年修订版中，陈著中都没有讲到此观点。

87 “此时间段，来源于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毛泽东选集》（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7页。

88 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周年》，第5-14页。

8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5），第66页。

90 《杨书评》，第187页。

20. 第 640 页，注释 36 是引用王善中的文章，说“200 名资本家被捕，其中 48 人企图自杀，服毒者有之，悬梁者有之，投水和跳楼者亦有之，其中有 34 人一死百了”；王原文说，“已有 200 多名资本家被捕，自杀事件达 48 起，死了 34 人”<sup>91</sup>，而王原文中的资料是引用薄一波的著作，薄原文是“逮捕了 200 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 48 起，死了 34 人”<sup>92</sup>。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陈著在引用时，进行自我发挥，薄著中的“200 多人”到王文中引用也是“200 多人”，到陈著中却变成“200 人”，少个“多”字，人命关天，数字要忠于历史事实，尽管薄著中的数据也不一定是事实，可以反驳与论证，但是，引用必须忠于参考文献，即使出现问题，也是引文作者的责任，而且陈著还添油加醋地描述“服毒者有之，悬梁者有之，投水和跳楼者亦有之”。不能理解的是，薄的著作也陈著的一个重要参考书目，为什么不直接引用薄的著作呢？非要引用一篇引用薄著的文章，即使引用，也应该是转引，因为，此数据是王引用薄著中的资料，不是王文中的直接资料。

21. 第 641-642 页中，“武汉大资本家贺衡夫，进口吗啡和海洛因 4000 两”。从给予的注释 38 中看出，引文史料出于马朴贞、鞠志刚的一篇文章，但是，陈著在引用时，出现三处错误：一，引用原文中毒品的种类“鸦片”，而到陈著中却变成“海洛因”。二，是没有认真阅读马、鞠的文章，以至于引用出现低级的错误，特别是把 4000 两“吗啡和海洛因”的毒品归于贺衡夫所为，明显是错误的，而原文中是“据统计，从全国解放到 1952 年初，活动在该线（以香港、澳门为根据地，以广州为转运站，水陆两线进行罪恶活动）上的大小走私集团不下 15 个，走私进口货物中，包括大量吗啡、鸦片约在 4000 两以上”<sup>93</sup>。从上下行文的逻辑关系看，4000 两的毒品，不能算归于贺衡夫的罪名，陈著属于没有看清全文的上下关系内容，盲目引文，导致错误。三，是贺衡夫案，到

91 王善中：《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70-76 页。

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170 页。

93 马朴贞、鞠志刚：《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禁毒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6 期，第 40-46 页。

1953年4月就因“案情不实（陈著也提到），改正”<sup>94</sup>，陈著写作和出版时，贺衡夫早已经落实政策<sup>95</sup>，为什么陈著还要把贺案当作一个反面典型运用，尽管陈著中提出质疑，“我们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类似的报导，却无法知道其中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马、鞠的文章把贺案当作反面典型源于当时媒体的报导，没有对该案进行全面历史性分析，历史的多面性，没有呈现出来，也是不准确的，导致陈著出现此种问题。

22. 第 681 页，“（匈牙利事件）也造成了 2 万余匈牙利人的死亡”。此结论，在 1998 年初版的 664 页，没有给出史料来源，2001 年修订版中给予的引文注释 39 是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的一篇文章，但是，查阅此文章，通篇就没有提到，匈牙利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sup>96</sup>；同时，在 1998 年初版 664 页中有关于波兰事件的伤亡数目字是“导致 200 多人受伤，84 人死亡”，到 2001 年修订版 681 页却变成“造成数百人的死伤”，前后版本相关内容的变化，应该是看到新增加的注释 39 文章后，对 1998 年初版中的数字，在 2001 年修订版中进行模糊处理的结果。因为师文中波兰事件的伤亡数字是“造成 74 人死亡，伤 900 多人的严重事件”，而且陈著对引文的处理也存在问题，此文发表时，署名是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而陈著引用时，却把李海文整理去掉<sup>97</sup>。至于《领导文萃》转载时，仅署名李海文<sup>98</sup>，是师哲与李海文之间版权的问题或陈著引用此文也可以，但是，学术文章的引文一定要忠于原文，不能随意处理。同时，注释下面，还附有作者进一步的解释，“他（邓小平）是当时中苏共紧急会议中第一个主张以苏军坦克镇压的共产党领导人”。“第一个主张”此观点的证据何在？但是，到 947 页，“他（邓小平）站起来慷慨陈辞，认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体制濒临解体，苏军必须立即全面镇压，不容犹豫”。同一本著

94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 443 页。

95 陈义伯：《武汉工商界巨子贺衡夫的一生》，《武汉文史资料》（30 辑），1987 年，第 67-77 页。

96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1-17 页。

97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 11-17 页。

98 李海文：《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领导文萃》，1997 年第 8 期，第 51-56 页。

作，此处就没有“第一个主张”，相关内容的表述出现前后矛盾现象，原因是什么？应该保持前后叙述立场一致，否则，要给予注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变化，更要有史料的支撑。

23. 第 690 页，“汉阳第一中学是学生运动的重镇，其中有三名教育界人士，包括两名老师，当着 1 万名师生之面被枪决”。此论断，在 1998 年初版 673 页中原表述为“有三名右派学生便当着 1 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提出质疑并作新的注解，“被杀者罪名也并非‘右派’，且不是学生，三人中王建国为副校长，钟毓文为语文教员，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sup>99</sup>。2001 年修订版，为回应杨教授的质疑，陈著作出上述内容的修订，并增加两个新的注释：一是文聿的《中国左祸》<sup>100</sup>，二是杨教授的书评补充的解释。但是，问题还存在：一，仍然没有解决史料来源的问题，因为杨教授书评中的解释，也没有给出史料的出处；二，2001 年修订版中的叙述也存在问题，“三名教育界人士，包括两名老师”，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怎么成为教育界人士？还有“当着 1 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这个细节，史料何在？其实，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楚，“汉阳一中事件”，当时影响较大，国际上也关注到此事，被称为“中国的小匈牙利事件”，司法界早在 1986 年就发表过文章<sup>101</sup>；地方文史资料和学术界也发表文章介绍过“汉阳事件”的来龙去脉<sup>102</sup>，原本已经清清楚楚的历史事件，绕来绕去，既没有提供史料来源，也没有讲清楚事件的概况，更不能理解的是，朱正的著作，也是陈著的参考文献这一，明明朱著中已经将“汉阳一中事件”讲的明明白白，包括“当着 1 万名师生面前”的历史细节<sup>103</sup>（朱著也是引用当时公开的报导，1 万名师生，肯定是夸张之数据），舍近就远，不用朱著来当

99 《杨书评》，第 185 页。

100 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 年，第 202 页。

101 湖北高级法院刑三庭：《冤案昭雪 教训深刻——记一九五七年“汉阳事件”的平反》，《人民司法》，1986 年第 5 期，第 20-22 页。

102 《汉阳一中事件始末》编辑委员会：《汉阳一中事件始末》，《蔡甸区文史资料》（8 辑），2000 年；戴礼华：《“汉阳一中事件”回眸》，《党史天地》，2006 年第 9 期，第 40-42 页。

103 朱正：《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04-307 页。

作参考文献，而用杨教授的书评作注释，关键是杨教授的书评，关于此问题也没有给予参考文献，最终也没有解决史料来源问题。

24. 第 723 页，注释 17 存在的要义，应该是对正文中的论断作注解，给予的参考文献是高华教授的名著，但是，在高著 95 页，根本就没有陈著 723 页正文中所要证实的内容<sup>104</sup>，而且在高著中，相关内容也是引用《缅怀刘少奇》一书，《缅怀刘少奇》书中也没有明确指出是柯庆施，只是说“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还指着少奇同志的鼻子骂他是‘老右’”<sup>105</sup>；在《刘少奇传》中，作者用中性语指出，“有的人甚至在发言中指责刘少奇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合法主义’，等等”<sup>106</sup>；在专题研究白区工作的专著是这样叙述的，“有的甚至还认为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合法主义’等等”<sup>107</sup>。“那个”、“有的人”或“有的”，高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明是柯庆施，但是，高教授也没有给予史料来源，是自己的判断<sup>108</sup>。在中共党史上，坚持“左倾机会”的人，大有人在，高教授的判断存在的问题是仅是个人的判断，没有直接的史料论证。陈著即使引用也属于转引，最起码应该加以阐释，不能直引，应该标注转引，不知道陈著，为什么这样来操作参考文献，应该为证明刘与柯之间“不睦”，可是，与正文中“甚至被迫自杀”，毫无关系，失去注释的原本涵义。这样下去，会引起学术界对相关历史事实的研究逐渐模糊起来，以至于产生如此，没有史料来源继续回环地引用下去<sup>109</sup>。

---

104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 95 页。

105 《缅怀刘少奇》编辑部：《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5 页。

1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259 页。

107 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34-235 页。

108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18 页。

109 “柯庆施在发言中更是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柯庆施与刘少奇的矛盾已经公开化”。邢思源：《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13 年，第 32 页。（“看到邢文后，笔者就认为，邢文一定受高著的影响，只不过没有给出参考文献。通过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贾艳敏教授联系到作者，邢承认文献来源于高著《红太

25. 第 724 页，“3.3 万左右的党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或劳改”，“另有 147 人罪名较轻，只是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此两处数据，给予的注释 19、20，表明史料来源于参考文献的 306、308 页，但是，在原著中 306 页的数据是“党员右派三万二千九百三十八人”，在参考文献中是具体的数字，到陈著中却成为“左右”；但是，“另有 147 人罪名较轻”，在 308 页根本没有提供<sup>110</sup>，不知道陈著中的此数据来源何处？引文一定要忠于原文，特别是史学著作，是严肃的社会科学，更不能无中生有。

26. 第 725 页，注释 25，问题：一，书名搞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年》，陈著中多次出现此书，如 727 页注释 24 等，书目还少时间的界定（1949-1989），到 1056 页书后附的参考书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同样少时间的界定（1949-1989）；二，在注释 25 给出的参考文献 146 页，没有正文提到的内容，正文中的内容在原著的 145 页和 190 页<sup>111</sup>。

27. 第 814 页，注释 17，问题：一，注释给予的参考文献中，没有正文中要论证或参考的内容，不知道，为什么陈著中多次出现此种现象，失去参考文献存在的意义，同时，参考文献《顾准传》，是经济学家的传记，不是关于军事或与彭德怀相关的专著，为什么要参考此书？术业有专攻，应该参考相关专业著作。二，注释 17 的后面的内容，倒是参考文献应该论证的内容，但是，陈著又进行再加工。参考文献原著中说“（彭德怀）因上‘万言书’而挨斗时，就被一位领章上缀着四颗金星的大将，冲上去当众劈了一个火辣辣的大耳光”<sup>112</sup>，陈著另外添加上，“这个大将很可能就是罗瑞卿”。三，最致命的是，参考文献《顾准全传》中引用的相关内容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是错误的。1959 年“庐山会议”时，

---

阳》，因当时考虑到有些敏感书籍和材料不便引用，没有敢于给出参考文献，以至于造成现在的缺陷，当初应该作个注释”。2023 年 7 月 7 日，作者与邢的联系交流）。

110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第 306、308 页。

111 马齐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145、190 页。

112 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452 页。

固然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批判，但是，还不至于到“挨斗时，被打耳光”的地步，因为彭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sup>113</sup>，所以陈著的注释17说是1959年，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同时，陈著还认为打彭德怀耳光者，“这个大将很可能就是罗瑞卿”，“很可能”一词语，是猜测性质的词语，而且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到底是谁打彭德怀，历来有不同说法。但是，《彭德怀全传》给予权威的说法，“历史瞬间一幕：时间：1967年9月1日下午；地点：北京市东郊工人体育馆，（北京）卫戍区一位副司令，……抡起手臂，一记耳光落在彭德怀脸上，并伴之以叱怒喝。……随之而来的又是一记耳光。动手打人的那位副司令，50年代在军委训练总监部下属计划监察部任过副部长”<sup>114</sup>。看看《罗瑞卿传》就知道，按照时间顺序对照一下所任的职务，就会知道不是罗瑞卿<sup>115</sup>。

28. 第846页，“中央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中，便有五分之三的人受到审查。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元帅将军、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所以特别令人触目惊心”。注释49给出的参考文献中，原文却是“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sup>116</sup>。在原著的75%即四分之三到陈著中却变成五分之三即60%，百分比的数量竟然少15%，历史事实发生巨大变化，这倒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历史事实”，但是，却不是真的“历史事实”（至少15%的干部，少受到审查）；而且，在陈著中，还把原著的叙述顺序作调整，导致意思发生重大变化，原著中是“中共中央的大部分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国家主席、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国务院的副总理、各部部长、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几乎都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打倒了。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原著的原意是“打倒了”

---

113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57页。

114 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3），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087-1088页。

115 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659-672页。

116 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到陈著中却变成“审查”，涵义不尽相同<sup>117</sup>，引用文献要忠于原文。

29. 第 914 页，图片介绍文字中，“素有红色资本家之称”，“他掌握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商机，首先在中国作巨额投资”。陈著有太多的没有史料来源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读者还能读懂，尽管，可能不知道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此处，读者一定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被称为“素有红色资本家之称”，除非是比较专业的人士。应该作注释解释一下，他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老板哈默<sup>118</sup>。

30. 第 938 页，注释 13 是参考刘应杰的一篇文章，但是，引用的文字与刘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有较大的差别，甚至发生变化。一，刘文说，“到目前（1996 年即刘文发表的时间），据有关部门统计”，到陈著中成为“中共官方统计数字”，刘文是一篇学术论文，而且表达的是“有关部门”，意思或许是学术机构，或许是官方统计机构（如国家统计局或政府公报等），引用到陈著中却变成“中共官方统计数字”；二，刘文发表的时间是 1996 年，陈著表达成为“1990 年代”，时间的界定有一定的问题；三，数字的引用也不规范，刘文中，“全国常年流动的民工约有 5000-6000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民工超过 2000 万”，到陈著中，却成为“常年流动的民工数字为 5000 万到 6000 万之间，其中跨省跨动的民工数目约为 2000 万”，把刘文中“5000-6000 万人”前面的“约”去掉，同时，还把“超过 2000 万”中的“超过”变成“约”字<sup>119</sup>。

31. 第 944 页，注释 22，给出两本参考文献，其中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的 567 页，没有正文中所要参考的内容，未起到引用的参考作用<sup>120</sup>，无法理解的是，陈著中多次出

---

117 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第 10 页。

118（美）鲍勃·康西丁著、刘胡，等译：《不平凡的一生：哈默传》，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年，第 14-41 页；杨东平、赵宏：《无所不成的红色资本家——哈默小传》，《领导科学》，1986 年第 1 期，第 42-43 页；孟红：《邓小平与哈默博士》，《湘潮》，2009 年第 9 期，第 10-13 页。

119 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1-10 页

120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第 567 页。

现此种现象。

32. 第 1077 页，“芜湖：安徽人民出版社”，应该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 10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词语之间少“：”，有无“：”，涵义不一样，没有“北京人民出版社”此单位，只有“人民出版社”这个机构，办公地点是在北京；第 1085 页，《二十一世纪》杂志，期与号，混用；第 1090 页，余敏玲的《国际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文，少时间的界定（1925-1930）。